

# 生态文明对外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自塑”研究

杨梅 田捧

(吉林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生态文明”入宪彰显中国担当,相关对外话语实践推动了国家形象的自我建构。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以《中国日报》为例,历时考察2013—2023年间生态文明话语实践中的中国形象自塑。研究发现生态文明入宪前后,中国形象自塑在话语主题、策略和视角上均呈现出明显变化。入宪后的对外话语通过侧重环境议题积极接轨国际话语空间,并运用名物化、增加积极谓词和引述动词等话语策略,建构了珍爱自然、开放包容、和谐友善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研究揭示生态文明对外话语实践对中国自塑的影响,为理解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中国角色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中国形象;对外话语;话语策略;话语实践;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5-0013-15

## 0 引言

近年来,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该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明理念。该理念不仅在中国治国理政实践中得以贯彻,也通过对外话语实践传播到国际舞台,成为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探讨中国形象及其话语建构对于加强国家“软实力”和提升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刘丹凌等,2024)。当下,中国形象话语建构研究成果丰富并呈现出跨学科的特征,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研究整体偏重“他塑”、缺少历时研究、选题较为局限。此外,现有研究对于中国形象具体维度的探讨也不够充分,导致研究结果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关于多维度话语实践对中国形象“自塑”的影响研究有待深入。

鉴于此,本研究关注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对外传播和中国形象的历时自塑,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搭建分析框架,旨在通过分析《中国日报》相关报道探讨生态文明对外话语实践对中国形象自塑的影响,以期为理解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角色提供新的视角。

收稿日期:2024-12-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批判话语分析视域下儒学与美国生态哲学思想研究”(18YJAZH1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梅,女,吉林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话语分析和文化与话语研究。

田捧,女,吉林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话语分析和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杨梅,田捧.生态文明对外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自塑”研究[J].外国语文,2025(5):13-27.

1 中国生态形象话语建构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引人注目,其生态形象的建构既是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维度,也是全球环境治理语境中的话语实践。在生态文明的对外话语实践中,这一形象主要体现为“国际生态形象”。何伟等(2023)将“国家生态形象”界定为“本国或他国及其公众对该国生态文明建设中起影响作用的政治(含外交)、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因素的总体认知与评价”。正如黄国文指出,语言与生态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的研究属于“问题驱动”或“问题倒逼”(陈旸等,2022),因而此类探讨生态与语言互动关系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通过在中国知网上以“中国形象”和“国家形象”为关键词检索学术期刊<sup>①</sup>,共获取 1 218 篇相关文献<sup>②</sup>。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显示,国内对“国家形象”议题的关注始于世纪之交(何原昌,1996;汤光鸿,2004),随后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影响下关注度有所提高,当下其发文量总体呈现波动式增长。政治学、新闻传播学是最早开垦该议题的领域,并在发文量上长期占有优势。相比之下,中国语言文字和外国语言文字学科的研究占比不足 5%(见图 1)。尽管已有学者(胡范铸等,2010;唐青叶,2015)明确强调国家形象建构是语言性问题,亦有研究借鉴语言学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孙发友等,2016),但整体而言,该议题下的语言学研究不论在发文量,还是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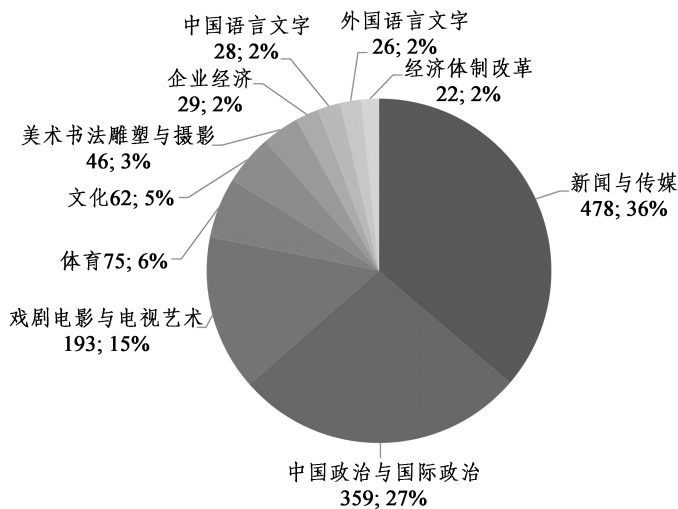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知网统计中国形象和国家形象主题期刊论文学科分布情况<sup>③</sup>(篇;%)

聚焦语言文字领域内的中国形象研究,主要包括修辞学、对外汉语教育、翻译研究和话语研究四个方面。早期研究将国家形象视为语言性问题,多从“主体间性”的特征下探讨

① 来源类别:北大核心、CSSCI。

② 最后检索日期:2024 年 8 月 2 日。

③ 每篇文献的学科归属并不唯一,且会重复计算。

传播国家形象的修辞学路径,并在后续研究中继续深化该领域的理论和模型(陈佳璇等, 2011; 胡范铸, 2017)。对外汉语教育也利用文化交流中的“主体间性”,反思国家形象在施教过程中的自塑现状(吴晓萍, 2011; 朱勇等, 2018)。国家形象主题下的翻译研究和话语研究多有交叉(谭载喜, 2018; 刘凯等, 2021),两者构成了该领域下的前沿转向(郇昌鹏等, 2022)。其中,话语分析方法的潜力和优势尤为突出(陈琳琳, 2018; 汪徽等, 2019)。此外,以上研究普遍集中于具体社会事件,例如活动、演讲等,普遍缺乏历时研究,未能在时间跨度上形成连续性分析。

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常包括“他塑”和“自塑”两种。这源于国家形象的基本概念(赵雪波, 2006),两者区别在于塑造主体的不同,换言之,是话语生产主体的不同。“他塑”视角下的研究语体选择较为单一,常选用外媒新闻话语(潘艳艳等, 2017; 黄蔷, 2021; Tang, 2021; Yang et al., 2023);“自塑”视角下的研究语体较为多样,包括官方话语(张虹, 2017; Li et al., 2020)、教材话语(耿直, 2018)、文学话语(刘凯等, 2021)、多模态话语(武建国等, 2021)等,但对本国新闻话语的关注相对较少。对于中国形象的生态维度,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学和语言学领域,形成了生态话语分析(许峰等, 2023)和批评话语分析(赵乾等, 2024)两个主要进路。这些研究为理解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形象建构提供了多样视角。

概言之,语言文字领域内除对外汉语教育外,多数研究对中国形象的“自塑”探讨较为薄弱。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偏重共时视角,忽视历时分析。在选题方面,则集中在政治、文学和学术话语,缺乏广泛性和多样性。此外,作为被建构的客观现象,构成国家形象的要素包括国家本身、其行为、各项活动及其成果(管文虎, 1999: 23),但现有研究往往以整体性概念来理解和研究某一语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未能深入探究其具体方面或对某一语体中形象的多维层次进行分类研究。

针对上述研究不足,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对比生态文明入宪前后主流媒体自塑本国形象的变化,探讨其背后可能的社会历史因素。具体探讨以下问题:入宪前后的生态文明对外话语在主题和话语策略方面有何历时变化? 这些变化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是什么?

## 2 研究方法

### 2.1 研究语料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确定了生态文明的宪法地位。此举不仅展现出中国在人类重大命题前的决心和态度,也拓展了生态文明话语的语体和内涵。基于此,本研究在 Lexis Advance

新闻数据库中以“生态文明”主要的英译形式为检索词<sup>①</sup>,分别获取该时间节点前后五年间刊登于《中国日报》、篇幅在 300 词以上的新闻语篇。经甄别重复并清理如文末链接、照片题注等无关内容后,组建入宪前后两个历时对比语料库(见表 1)。

表 1 生态文明对外话语语料库容量<sup>②</sup>

| 时间段 | 2013. 3. 10—2018. 3. 10 | 2018. 3. 11—2023. 3. 11 |
|-----|-------------------------|-------------------------|
| 文本  | 361                     | 549                     |
| 形符  | 497 016                 | 475 832                 |
| 类符  | 17 583                  | 17 985                  |

## 2.2 分析框架

中国对外话语实践大致涵盖建构(生产)、翻译(再生产)、话语传播(消费)三个阶段(司显柱, 2021)。林克勤(2018)指出,生态文明为新时代国家话语的重构提供了新视角。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认为中国形象的自塑本质上应是动态的:一方面,其国际建构需要不断进行话语的再生产,以适应不同的传播情境;另一方面,话语既反映社会现实,又具有形塑社会的反作用。因此,中国形象的自塑研究应兼顾话语实践的动态性和语境的历时性。

在方法论上,本研究将辩证—关系分析方法(Fairclough, 1992, 2014)与话语—历史分析方法(Wodak, 2001)相结合(Wodak et al., 2010),提出用于分析生态文明对外话语自塑中国形象的研究框架(见图 2)。在辩证—关系分析方法(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中,话语实践涉及文本的生产/生成(production)、分配/传播(distribution)和消费/接受(consumption)(辛斌, 2005: 55; 田海龙, 2009: 144),与文本、社会实践共同组成三维分析框架(Fairclough, 1992: 73),强调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辩证关系。同时,此概念也可作为独立的整体使用,等同于“交际过程”(辛斌, 2005: 55)。而话语—历史分析方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作为国家形象或身份研究的常用路径(曾蕊蕊, 2023; Yang et al., 2023),从话题、策略和语言手段及其实现形式<sup>③</sup>的三维度下层层聚焦,最终形成社会历时语境内对话语实践的系统阐释(Wodak, 2001)。

此种结合,不仅符合沃达克等(2014: 31)关于批评话语分析应综合不同理论与方法的建议,也使研究能够更全面、深入地探讨形象建构中话语实践的作用。应用于本研究中的综合分析框架,旨在分析话语的静态结构的同时揭示其动态变化。具体来说,首先从辩证—关系分析方法出发,分析生态文明话语在《中国日报》中的话语表达及其社会功能,然后通过话语—历史方法呈现话语的历时演变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

① 主要包括 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progress、eco-civilization、eco civilization、ecology civilization。

② 该分类沿用 Baker(2009)基于一致性分析所提出的主题词语义分类方式。

③ 语言手段(linguistic means)和语言形式/体现(linguistic realizations)。沃达克(2001)用类符(types)和形符(tokens)区分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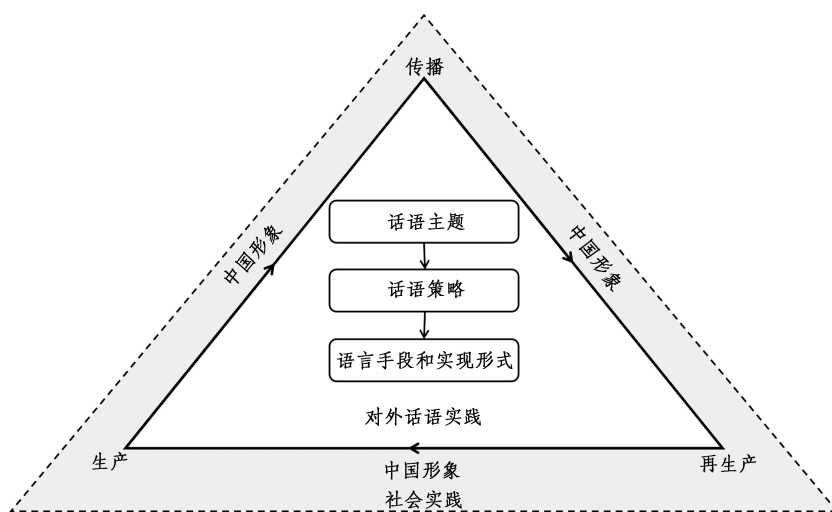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形象自塑的话语实践分析框架

### 2.3 研究步骤

根据中国形象自塑的话语实践分析框架,本研究采用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三维分析方法,对比入宪前后的话语变化并进行历时分析。首先,利用语料库工具生成主题词并进行聚类,对比分析生态文明话语入宪前后的语言特征。其次,参照主题词索引行进行话语策略及其具体语言形式分析,阐释生态文明话语自塑中国形象的方法策略及其历时变化。最后,回归到话语实践本身,结合语言特征和变化,进行社会历史语境分析。

## 3 分析与讨论

### 3.1 话语主题分析

析出话语主题是批评性分析双向路径的交叉点,向内可剖析具体话语策略及其对应的语言工具,向外可阐释话语实践的社会作用和价值。主题词(Keyword)或关键词反映语料文本的独特之处,显示出某种表达信息的方式(钱毓芳,2010),其结果受参照语料库影响。贝克(Baker,2014:38)总结进行两个及以上观察语料库主题词比较的两种方式,一是彼此作比,侧重突出不同点,二是参照第三方语料库,兼顾异同点。

根据探析生态文明对外话语入宪前后变化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将这两个容量相近的观察语料库相互对比,借助语料库软件 AntConc(Anthony,2023)提取主题词。为更加直观呈现文本信息,研究依据索引行将主题词进一步聚类<sup>①</sup>,归纳出语义词和语法词两类,包含地点、范围、身份、人物和主体、行为、概念、政策和管理、环境、事件和健康10个话语主题(见表2)。

以“生态文明”入宪为时间节点,对比《中国日报》前后五年的新闻语篇发现其话语主题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sup>①</sup> 该分类沿用 Baker(2009)基于一致性分析所提出的主题词语义分类方式。

表 2 生态文明对外话语主题词聚类

| 话语主题       | 2013—2018                                                                       | 2018—2023                                                        |
|------------|---------------------------------------------------------------------------------|------------------------------------------------------------------|
| 语义范畴       |                                                                                 |                                                                  |
| 地点         | Xinjiang, Uygur                                                                 | Kunming, Yunnan, Qinghai ( Qinghai-Tibet Plateau )               |
| 范围         | autonomous, rural, social, urban, cultural                                      | global, ecological, world, biological                            |
| 身份         | ethnic, minorities, minority, groups                                            | disabilities                                                     |
| 人物和主体      | Party, people ( the People ’ s Republic of China ), government, central, public | nature, China, ( Ministry of ) Ecology ( and Environment )       |
| ( 名物化 ) 行为 | improve, develop                                                                | transition                                                       |
| 概念         | basic, system, rights                                                           | biodiversity, neutrality, civilization, ( biological ) diversity |
| 政策和管理      | reform, insurance, autonomy, funds, reforms                                     | ( biological ) conservation, green ( development )               |
| 环境         | /                                                                               | carbon, climate, species, ( climate ) change, waste              |
| 事件         | /                                                                               | COP, BRI                                                         |
| 健康         | /                                                                               | pandemic, COVID                                                  |
| 语法范畴       |                                                                                 |                                                                  |
| 人称代词       | we, our                                                                         | he                                                               |
| 连接词        | and                                                                             | /                                                                |
| 情态动词       | will                                                                            | /                                                                |
| 助动词        | /                                                                               | has                                                              |
| 转述动词       | /                                                                               | said                                                             |

第一,环境议题关注度提高。在 2013—2018 年的生态文明对外话语中,环境、事件和健康主题下并未析出主题词。在 2018 年后,对外话语中环境主题词显著增多,事件主题中出现了主题词“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COP)和“一带一路”(BRI),健康主题则多与新冠疫情相关(pandemic, COVID)。除“一带一路”外,事件和健康主题词大多具有时效性,紧贴当时的社会事件。然而,环境议题受社会热点事件和背景影响相对较少。该主题下主题词的显著增多,表明入宪后的生态文明对外话语不仅囊括了原有内容,还新增了包括实际的碳中和措施(carbon, neutrality),具体的环境领域(climate, change)与保护目标(species)和污染形式(waste)更多内容。

第二,话语建构的视角和空间扩大。地点主题词由原来单一地区(Xinjiang, Uygur)扩展为城市“昆明”(Kunming)、省份“云南”(Yunnan)和地区“青藏高原”(Qinghai-Tibet Plateau),形成层层递进的话语空间。同样,范围主题词由“自治区的”(autonomous)、“农

村的”(rural)和“城市的”(urban)扩展为“全球的”(global)和“世界的”(world),这是话语视角和空间的扩大,也是对话语消费者主体的丰富。

第三,国际意识的主动凸显。概念主题词从入宪前的“人权”(human rights)转变为入宪后的“生态多样性”(biodiversity, biological diversity)。此种变化受到具体社会事件的影响。2021年10月,因疫情推迟的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中国昆明成功举办。由于会议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因此“生物多样性”在这一阶段成为具有显著性的主题概念。

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在于探讨人与自然之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理念的核心表达<sup>①</sup>。《中国日报》在表述“人与自然”概念时使用了多种表达方式。依据标准化频次统计,虽然绝大部分表达沿用至今,但是在“生态文明”入宪后的时间段中,其使用频次在整体大幅提升,尤其是“man and nature”以及“humanity and nature”(见表3)。

其中,“man and nature”的使用频次和提升幅度最高,这表明生态文明对外话语通过更通俗易懂的方式自塑中国形象,以容纳更多的受众。而“humanity and nature”由原来的第五位上升至第二位,其变化原因值得探究。“Humanity”在语体层面较为书面,在词义上也包含多种含义,既可以指代全人类这个整体概念,又可以指代“人性”以及“仁爱”这种正面积积极的人类特质。这样的表达旨在挖掘人性之善,进行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哲学探讨,反映出生态文明对外话语在自塑中国形象时积极融通中外文化,在建构国家理念时兼顾国际意识。

表3 “人与自然”词组

| “人与自然”词组        |                         | 标准化频次     |           | 变化       |
|-----------------|-------------------------|-----------|-----------|----------|
|                 |                         | 2013—2018 | 2018—2023 |          |
| Harmony between | man and nature          | 24.179    | 170.622   | ↑146.443 |
|                 | humans and nature       | 12.090    | 84.258    | ↑72.168  |
|                 | human and nature        | 10.075    | 14.745    | ↑4.670   |
|                 | people and nature       | 10.075    | 44.235    | ↑34.160  |
|                 | humanity and nature     | 8.060     | 139.025   | ↑130.965 |
|                 |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 4.033     | 16.871    | ↑12.838  |
|                 | humankind and nature    | /         | 4.213     | ↑4.213   |

### 3.2 话语策略分析

话语策略指人们为达到某种社会、政治、心理或语言修辞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话语行为(Wodak, 2001),话语—历史分析方法归纳出命名、述谓、论辩、视角化,以及强化与弱化

<sup>①</sup> 该表达始于党的十八大(2012年)。

五种策略。这些策略常用来分析和诠释政治话语中存在的社会不公、逻辑谬误、权力关系等,同时也广泛应用于个人或集体身份或形象的建构研究中。结合语料特征和策略出现频率,本研究重点分析命名、述谓、视角化和强化四种策略。

### 3.2.1 命名策略和述谓策略

命名策略体现在通过特定的命名方式来塑造或改变对象的形象和认知,述谓策略则借助带有不同感情倾向的评价谓词表现话语生产者的态度与立场,在具体表达中两者常常相连。

以主题词“China”为例,对其索引行的分析表明,“China”相关的命名策略主要通过隐喻性与非隐喻性的指称名词实现。进一步检索与对比后发现,指称“China”的语言形式在入宪前的生态文明对外话语中共出现 82 处,而在入宪后增加至 176 处(见图 3)。后者在包含入宪前命名形式的基础上,使用了更加多样的命名形式,尤其是在评价性谓词的使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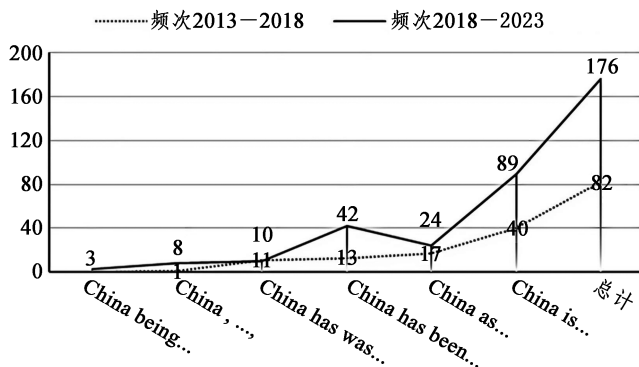


图 3 指称“China”的主要语言手段和实现形式频次

观察索引行发现(见表 4、表 5),命名策略使用诸如同位语、主系表结构等语言手段对“中国”这一主体进行隐喻或非隐喻指称。非隐喻指称词中“country”和“economy”在入宪前后都是频次较高的指称词。然而,隐喻指称词如“leader”“contributor”“player”“partner”等不仅在入宪后对外话语中频次上有所增加,而且形式也更为多样。显然,使用人格化的名词作为指称(梁晓波, 2013),能够使对外话语更加形象和生动,进而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

述谓方面,前五年所使用的谓词较为固定,如“large”“responsible”“unified”“multiethnic”“largest”等,侧重于展示中国的制度、民族构成和经济发展。后五年谓词和指称中心词的使用则更加多样,增加了“home”“proponent”“advocate”等指称,侧重强调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国际事务中的贡献,并搭配如“leading”“active”“productive”“diverse”“vigorous”“enthusiastic”等谓词,呈现出更加立体、多样的中国形象。

除了“China”的命名形式,人称代词“we”的使用也是生态文明对外话语中直接建构国

家形象的策略之一。在形象或身份建构的过程中,人称代词“we”的使用较为特殊,既可以建构包容的“群内”(in-group)身份也可以建构排外的“群外”(out-group)身份。

对比分析入宪前后索引行后发现,在对外生态文明话语中,“we”大部分情况下用来自指“China”。但是,在入宪前话语中,它也用来指代“(China) government”或者“Party”等自我身份;而在入宪后话语中,“we”更多用来指代“human beings”“countries”等群体性、国际性的更为宏观的整体概念。

这一变化与“China”的命名策略相映照,即在生态文明对外话语实践中体现出动态的自塑意识,主动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群内”建构自我形象。

表 4 China 的部分索引行(2013—2018)

|        |                                                                                           |
|--------|-------------------------------------------------------------------------------------------|
| China  | as anexample in developing a green economy for less developed regions.                    |
| China  | has become animportant participant , contributor , and torchbearer in the global          |
| China  | is acritical partner in efforts to tackle threats facing Africa’s wildlife treasures.     |
| China  | is a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a population over 1.3 billion,                          |
| China  | is aleader in nurturing the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ng i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
| China  | is a major trading nation ,                                                               |
| China  | is aresponsible country .                                                                 |
| China  | is astrong suppor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ause.                             |
| China  | is a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inhabited by 55 minority ethnic groups ,                  |
| China  | is now the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
| China  | is thelogical successor as the key promoter of global warming mitigation.                 |
| China  | is theworld’s largest agricultural producer ,                                             |
| China, |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 is also experiencing unprecedented environmental |
| China  | was amongthe first countrie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a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lan,   |
| China  | was the first to voice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

3.2.2 视角化策略

视角化策略通过选择特定的视角、观点或立场来呈现事实或事件。本文统计并考察了中性转述动词“said”的搭配词与索引行,对比分析入宪前后生态文明对外话语的视角变化。分别检索“said”的跨距为左 5 至右 5 的前 10 位搭配词,依据对数似然比(Log-Likelihood)由高到低,入宪前排名前十的高频搭配词包括“he”“Xi”“and”“director”“that”“to”“it”“civilization”“we”“ecological”,而入宪后的高频搭配词包括“he”“she”“and”“adding”“Xi”“that”“to”“director”“president”“at”。除“she”“adding”和“at”之外,入宪前后“said”的搭配词基本保持一致。

表 5 China 的部分索引行(2018—2023)

|        |                                                                                                    |
|--------|----------------------------------------------------------------------------------------------------|
| China, | as akey <b>player</b> in enhanc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gan to express the need to reduce    |
| China  | as a <b>major country</b> lives up to its responsibility for advancing the interests of humanity.  |
| China  | as <b>leading country</b>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een development                            |
| China  | has become an“ <b>active contributor</b> ” to conserving global biological diversity.              |
| China  | is a <b>large productive country</b> and open to other civil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ialogues”. |
| China  | is a <b>mega diverse country</b> and <b>home</b> to some of the most stunning species.             |
| China  | is a <b>responsible major power</b>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
| China  | is a <b>supporter</b> , <b>practitioner</b> and <b>promoter</b> of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
| China  | is a <b>vigorous proponent</b> of reform of the UN special mechanisms for protecting human         |
| China  | is also an <b>active participant</b> i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
| China  | is an <b>advocate</b> of multilateralism.                                                          |
| China  | is an <b>enthusiastic participant</b> and an <b>proponent</b>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
| China  | is now akey <b>economic contributor</b> to the UN and critical to UN peacekeeping missions.        |
| China  | is now by far the <b>most enthusiastic tree planting nation</b> in the world,                      |
| China  | is the <b>only major economy</b> that has registered positive GDP growth rate since the start of   |

视角的变化反映了话语前景化内容的转变,根据转述动词“said”的搭配词可知,入宪前的生态文明话语中转述消息来源的主体有限,集中在较为官方的内容上,且较少进行详细阐释。入宪后生态文明话语则十分注重对行为、事件和概念再现的全面性。具体体现如下:

第一,大幅度丰富转述消息的来源,特别是国际声音的转述,消息来源主体包括国际组织、专家等。第二,增加对于女性话语和观点的引用。“she said”在 2013—2018 年仅出现 14 次,而在 2018—2023 年升至 114 次。第三,注重对所引消息的全面展现,大量使用“adding that”的状语从句和“at”引导的地点或时间状语对消息进行补充说明。

视角化策略分析显示,生态文明对外话语在自塑中国形象时侧重于严谨、全面和负责等特征。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普通民众观点和态度的再现,使得话语具有距离感,降低了亲和力。

3.2.3 强化策略

强化与弱化策略的语言工具包括(情态)小品词、附加疑问句、虚拟语气、犹豫、模糊表达、夸张或曲言、间接言语行为以及表示所说、所感与所想的动词(Reisigl et al., 2014: 94)。鉴于“will”和“has”在入宪前后生态文明话语中均体现出强化功能,本节对这两个词的搭配情况进行检索,并结合具体语例对其强化策略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

情态动词“will”作为入宪前生态文明话语的主题词,同时也是话语中运用的强化策略。情态动词是表示说话人态度和立场的最主要的手段(张楚楚,2007)。在系统功能语

言学中,情态动词属于人际功能的体现,通常可分为表示概率判断的“情态化”与表示义务或倾向的“意态化”。结合索引行发现,在生态文明对外话语中,“will”主要体现其意态化功能,表示对于承担义务的倾向性和积极态度。

依据韩礼德对情态动词量值的划分(Halliday et al., 2004: 116),“will”属中量值情态动词。结合例(1)~(3)发现,入宪前的生态文明对外话语使用情态动词“will”作为强化策略,既能较为明确地表达出语篇生产者的态度又不至于在语气上太过绝对而难以被接受。这种策略侧重于展现中国政府对于承担责任、践行承诺和实施行动的决心和担当。

(1) We **will** *continue to* focus on ensuring and improving people's wellbeing and giv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agriculture, education, social security, heal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 3. 15\_Full text: Report on China's economic,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2) China **will** *work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 steadily advance demonstration projects, jointly identify programs that accommodat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interests, and accelerate the launching of programs that are agreed upon by parties and ready for implementation, so as to ensure early harvest. (2015. 3. 30\_Initiative offers road map for peace, prosperity)

(3) We **will** *continue to* make our contribution to world peace and global development and uphol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2017. 3. 29\_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入宪后的生态文明对外话语中,强化策略的运用多体现为完成时句式“China has+实义动词过去分词”的重复使用,以及与该句式搭配的大量具有强调意义的正面谓词。

例(4)~(6)中,生态文明对外话语频繁使用“has”的句式,并搭配“notable”“incredibly”“seriously”等在具体语境中具有积极评价意义的谓词,用于修饰小句中话语行为的施事者。此种强化策略侧重于展现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事业上已取得和正在推进的成就,以贡献为导向对中国形象进行自塑。

从“will”到“has”的强化策略演变表明,生态文明对外话语实践中,中国更加注重突出其在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实际付出与成就,着重塑造自己作为“contributor”的形象。

(4) China **has made** *notable* progress i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king concerted efforts to realize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2020. 10. 26\_Torchbearer for climate governance)

(5) China **has taken** *incredibly* tough action to fight the virus, especially with the quarantine measures implemented in Wuhan and Hubei province. (2020. 3. 23\_Lessons learnt on wildlife

protection)

(6) Furthermore, China has taken seriously its development role by providing global public goods such as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reduc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and promote global stability. (2023. 1. 5 \_ Country seeks development, peace for humanity)

### 3.3 社会历史语境分析

话语的变化,实际上也是社会现实的变迁。“生态文明”作为中国语境下的原创理念,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根植在社会主义土壤。随着“生态文明”理念逐步纳入国家价值体系,其话语形式和内容及其对于中国形象的自塑也随之发生变化。

入宪前,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缺乏主动性。这一时期,主流媒体有关生态文明的报道多为政府工作报告和白皮书的全文转载,局限于文字翻译层面。尽管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但也可能导致“生态文明”理念常与政治维度相关,从而造成话语传播上的距离感。例如,环境话题“environment protection”虽然是入宪前生态文明对外话语中的高频 N 元组(N-Gram),但常与“Ministry”(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一词相关联,而非直接指向生态文明理念本身。

入宪后,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变得积极和多样化。其新闻语料几乎不再出现长篇政策和报告的全文转载,而是更加聚焦于特定主题。例如,国际层面的生态文明实践如“COP15”“一带一路”等成为话语主题和生态文明理念传播平台。此外,有关中国的自我指称中,谓词“responsible”、指称词“contributor”和“leader”等的增加,凸显了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和领导作用。同时,话语策略的实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丰富了谓词和指称形式,强调了生态文明理念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如包容与和谐。

入宪后的话语实践和形象塑造也获得外媒的积极评价。2018 年 3 月 18 日,新加坡《海峡时报》称赞中国新设生态环境部,并引用时任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的话称其为保护环境的“巨大进步”(a major step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进一步肯定并强化了生态文明对外话语中构建的负责且务实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形象。2024 年 4 月 19 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题为“Xi Thinks China Can Slow Climate Change. What if He's Right?”的观点文章,称中国为“气候友好技术的世界引领者”(the world's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climate-friendly technologies)。虽然其中也不乏对中国制度和环境问题的批评和偏见,但整体上对中国在绿色技术和能源转型方面的努力给予了较为正面的评价,并提出具有前景的展望,建议推进中美合作。

这其实也体现出欧美大报对于中国自塑形象的矛盾状态,即中国虽然有所贡献但仍不

能被完全信任。《纽约时报》虽然设有中国与环境专题,持续关注中国的环境政策和行动,却往往将能源消费和产出作为新闻议程的重点,刻意忽略中国所作的各种实际行动,常常要求中国为各种“后果”“担责”(responsible for...)。英国《卫报》也持类似态度。2021年10月16日,《卫报》曾将生态文明理念与“空谈”(an empty slogan)相连,并使用温室气体最大“排放者”(world's biggest greenhouse gas emitter)和自然资源的“消耗者”(largest consumer of natural resources)的惯用指称塑造中国形象。2019年7月12日,该报还曾使用“生态独裁”(A sort of eco-dictatorship)来命名上海推行的垃圾分类政策。可见,“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中的接受程度不如“参与”和“引领”的特征。但是,这种态度背后也掺杂着西方对于话语权的滥用,值得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入探讨。

通过社会历时语境分析,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形象自塑的动态过程。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化和全民共识的增强,入宪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契机,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范围也逐渐扩大。生态文明理念的话语构建,助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持续优化和提升国家形象。从静态的“报道”到主动的“自塑”,生态文明对外话语的转变彰显了中国形象塑造的主动性,体现了在对外话语实践中融入国家形象意识的重要性,以及充分运用文本和话语之间各种时空关系的必要性。

#### 4 结论

对外话语不仅负载国家意识,也建构国家形象。国家理念“生态文明”既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核心方略,也是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有机体。本研究基于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创新分析框架,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对中国主流媒体过去十年间的生态文明新闻语篇中中国形象的自塑进行历时研究。研究发现,2013年至2023年间,生态文明对外话语呈现出鲜明的国家意识特征,与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入宪后,话语主题更为丰富,话语策略和视角不断拓展,主动彰显其人文内涵,实现了从被动“报道”到主动“自塑”的转变,进而塑造了珍爱自然、开放包容、和谐友善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话语对现实的塑造与反映并非“照镜子”式的简单映射,研究者应避免将社会现实的变迁简化为纯粹的话语(费尔克劳,2020)。首先,话语主体具有能动性,话语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话语生产者所生产的内容和形式,也受到话语消费者解读方式和接受程度的共同作用。其次,理念的传播和话语实践具有动态演化的特征。要有效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并掌握对外传播的主动权,需要统筹话语实践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以及基于这些过程的再生产和再分配。本研究旨在通过路径间的融合,探析中国形象在生态文明话语中的建构,以丰富中国形象自塑研究,挖掘对外话语实践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 Anthony, L. 2023. AntConc (Version 4. 2. 4) [Computer Software]. Tokyo, Japan: Waseda University. <https://www.laurenceanthony.net/software/AntConc>
- Baker, P. 2009. The BE06 Corpus of British English and Recent Language Chang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3): 312-337.
- Baker, P. 2014. *Using Corpora to Analyze Gender* [M]. London & New York: Bloomsbury.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2014. A 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G] // Wodak R. & M. Meyer.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 Halliday, M. A. K. & C. Matthiessen.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 [M]. London: Hodder Arnold.
- Li, T. & F. Pan. 2020. Reshaping China's Image: A Corpus-Based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J]. *Perspectives* (3): 354-370.
- Reisigl, M. & R. Wodak. 2014.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 [G] // Wodak, R. & M. Meyer.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 Tang, L. P. 2021. Trans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Image in the US Mainstream Newspapers: A Corpus-Bas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Journalism* (3): 804-820.
- Wodak, R. & M. Meyer. 201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G] // Wodak, R. & M. Meyer.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 Wodak, R. & N. Fairclough. 2010. Recontextualizing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The Cases of Austria and Romania [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1): 19-40.
- Wodak, R. 2001.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G] // Wodak, R. & M. Meyer.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 Yang, M. & Z. W. Wang. 2023. A Corpus-based Discourse Analysis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ed by Environmental News in The New York Times [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ommunications* (1): 545.
- 陈佳璇, 崔蓬克, 胡范铸. 2011. 言者身份与修辞力量: 国家形象修辞分析中的一个问题 [J]. *当代修辞学* (2): 70-76.
- 陈琳琳. 2018. 中国形象研究的话语转向 [J]. *外语学刊* (3): 33-37.
- 陈咏, 黄国文. 2022. 语言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作用——黄国文教授访谈 [J]. *鄱阳湖学刊* (1): 36-43, 126.
- 费尔克劳. 2020. 语言与全球化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耿直. 2018. 论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构建——以国际汉语教育为视角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3): 100-103.
- 管文虎. 1999. 国家形象论 [M].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 何伟, 程铭. 2023.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对外传播话语与国家生态形象塑造研究 [J]. *外语电化教学* (4): 84-91, 125.
- 何原昌. 1996. 人民眼中的国家形象——读《国家全景观——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问题》 [J]. *中国图书评论* (2): 61-62.
- 胡范铸. 2017. 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 理论、方法、案例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胡范铸, 薛莹. 2010. 作为修辞问题的国家形象传播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35-40.
- 邹昌鹏, 管新潮. 2022. 中国形象研究的话语与翻译转向——基于信息贡献度与文献计量的知识图谱分析 (1994—2021) [J]. *外语电化教学* (1): 56-62, 109.
- 黄蔷. 2021. 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话语偏见——以“新冠疫情”报道为例 [J]. *外国语文* (4): 85-96.
- 梁晓波. 2013. 国家形象的概念隐喻塑造研究 [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113-117.
- 林克勤. 2018. 论生态文明与当代国家话语构建 [J]. *外国语文* (5): 87-93.
- 刘丹凌, 匡贝茜. 2024. 新时代中国形象传播的话语实践逻辑 [J]. *外国语文* (5): 133-146.
- 刘凯, 余登兵. 2021. 基于积极话语分析理论的中国对外文学话语体系构建策略研究 [J]. *出版发行研究* (8): 79-84.

- 潘艳艳,董典.2017.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建构中国形象和大国关系的话语策略研究——以2016中俄联合军演的相关报道为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3):50-56.
- 钱毓芳.2010.语料库与批判话语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3):198-202,241.
- 司显柱.2021.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回顾与前瞻[J].当代外语研究(4):103-112,129.
- 孙发友,陈旭光.2016.“一带一路”话语的媒介生产与国家形象建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1):163-167.
- 谭载喜.2018.翻译与国家形象重构——以中国叙事的回译为例[J].外国语文(1):1-10.
- 汤光鸿.2004.论国家形象[J].国际问题研究(4):18-23,71.
- 唐青叶.2015.中国主流报纸媒体中的土耳其国家形象及涉土新闻话语分析[J].西亚非洲(5):98-113.
- 田海龙.2009.语篇研究:范畴、视角、方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汪徽,辛斌.2019.美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隐喻建构研究——以“美国退出TPP”相关报道为例[J].外语教学(3):32-38.
- 武建国,李均桥,张宏珊.2021.《美丽中国》解说词的多模态翻译及国家形象建构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5):31-41.
- 吴晓萍.2011.中国形象的提升:来自孔子学院教学的启示——基于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和布莱恩特大学孔子学院问卷的实证分析[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1):89-102.
- 辛斌.2005.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许峰,高意.2023.话语分析视角下中国国家生态形象自塑研究——以习近平主席外交话语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145-156.
- 曾蕊蕊.2023.话语—历史分析视角下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以2020年至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习近平主席对外讲话为例[J].外语研究(2):10-17.
- 张楚楚.2007.论英语情态动词道义情态的主现性[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5):23-30.
- 张虹.2017.社会文化语言学“指示原则”与国家形象构建——以习近平联大演讲为例[J].外语学刊(3):17-21.
- 赵乾,蔡舒敏.2024.中国生态环境形象的“他者化”呈现:基于《纽约时报》的话语机制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47-156.
- 赵雪波.2006.关于国家形象等概念的理解[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5):63-65.
- 朱勇,张舒.2018.国际汉语教材中国人物形象自塑研究[J].华文教学与研究(3):24-30,54.

## A Study of Self-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ag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YANG Mei TIAN Peng

**Abstract:** The constitutional incorpor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ignifies China’s commitment to global responsibility, while its related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ractice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image. Employing a corpus-bas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study uses *China Daily* as a case study to examine diachronic changes in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age in the discursiv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2013 to 2023. The findings reveal significant shifts in discursive topics, strategies, and perspectives following the co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has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environmental issues, aligned itself with global discursive spaces, and employed strategies such as nominalization, positive predication, and reporting verbs to discursively construct an image of China as an active, positive, and responsible global power that cherishes nature, embraces openness, and fosters harmony and friendlines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n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age,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role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Key words:**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discursive strategy; discursive practi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李小青